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 与经验*

刘义兵^{1,2} 朱胜晖^{1,2} 刘 达³

摘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为视角，重点探讨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特色的农民教育政策，不断引领农民走向美好生活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党领导下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具体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即政治解放与争取获得民主权利阶段（1921—1949年）、社会解放与投身新中国全面建设阶段（1949—1978年）、劳动解放与农村生产力活力释放阶段（1978—2012年）和个性解放与美好生活建设阶段（2012年至今）。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始终坚持党对农民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农民教育根本立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农民教育根本原则、“服务农民全面发展”的农民教育根本目的和“农民作为成人学习者”的农民教育基本规律，其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引领中国农民实现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过程。当前，农民教育应更加关注农民的文化精神成长与内生发展动力激发，通过高质量的农民教育推动形成农民内生性发展文化，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农民教育政策 农民解放 农民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①，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任何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农民作为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庄福龄，2004）。因此，为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农民参与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能动性，“应当赶快用我们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市精准扶贫的教育支持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6YBJY068）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本文通讯作者：朱胜晖。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

的一切宣传手段、一切国家力量、一切教育、一切党的手段和力量来说服非党农民”^①。以上“说服非党农民”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称之为农民教育，农民教育从本质上讲是帮助农民克服自身固有缺陷、释放发展潜能、实现全面解放的专业活动，政府（政党）制定的一系列用以指导和规范农民教育发展的行为准则即为农民教育政策。农民问题一直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农民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例如，韩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制定了《农村振兴法》，指导关于农民的农业经营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培训；加拿大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绿色证书项目，根据农业生产实际面向农民开展农业生产者、生产指导者、生产管理者等多层次的证书培训；巴西自1993年开始运作国家农业行业学徒培训体系，向农民传授技能和知识，努力做到哪里有农民哪里就有培训等。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民教育。如周朝设置“司稼”一职，负责督促农业生产；唐朝太仆寺设兽医博士，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农业专科教育；元朝推行社学制度，推动了农村教育的普及等。在长达数千年的农民教育实践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广博的经验，并以“农书”的形式传承下来，仅明清两朝“农书”总数就多达1388种，涉及土壤耕作、作物栽培、农田水利、畜牧兽医、经营管理、农学理论、农家生活等农业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王达，2001）。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从人的解放的高度认识农民教育的本质及其重要性，并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发展农民教育政策，推动中国特色的农民教育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的百年演进历程，系统分析其发展脉络和阶段特点，深入总结其内在规律和基本经验，科学阐明其未来工作重点，以期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教育体系、扎实推进农民教育现代化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历史借鉴。

一、农民教育政策的百年演进：引领中国农民解放不断走向深入

实现人的解放，通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袁杰，2017），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依据。在马克思看来，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类解放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历史活动，它需要经历不同层次与阶段的历史发展，因此，人类解放将具体地内化为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等向度的解放形式，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刘同舫，2012）。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农民和农民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特别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②，指出“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③。中国共产党以服务农民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遵循，制定并创造性地实践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农民教育政策，引领中国农民解放与生产力发展不断走向深入。

^① 《列宁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回望 1921—2021 年的百年历程，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分期问题一直是一个在不断探索中逐步深化认识的焦点问题（齐鹏飞，2011），研究者日益明确了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决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作为中共党史分期的标准（陈述，1999）。2021 年 2 月 3 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同志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一文。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主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主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 1978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主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 2012 年 11 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曲青山，2021）。这是中共党史分期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理清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确立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依据（陈晋，2017）。农民教育政策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必然受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制约，并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阶段演进特征相一致。本文充分参照曲青山同志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有机融合，具体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划分为“政治解放与争取获得民主权利阶段（1921—1949 年）”、“社会解放与投身新中国全面建设阶段（1949—1978 年）”、“劳动解放与农村生产力活力释放阶段（1978—2012 年）”和“个性解放与美好生活建设阶段（2012 年至今）”这四个阶段。

（一）政治解放与争取获得民主权利阶段（1921—1949 年）：唤醒农民革命意识，培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坚强动力

马克思在写于 1843 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和“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①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政治解放只能是处于资产阶级地位的人的解放而不是彻底的人类解放。但是，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不同，中国人民承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因此，中国人民一旦觉醒，必将进行更彻底的政治解放。自 1921 年建党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救国大业的“开天辟地时期”（曲青山，2021）。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②，党的主要任务是带领中国人民彻底结束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使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决定了这一时期农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唤醒农民革命意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培育力量，带领广大农民为实现自身的政治解放与争取自身的民主权利而奋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早期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1 页。

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①，但农民阶级由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低下，表现出狭隘、保守、涣散、迷信、愚昧、盲从等固有的缺陷（陈静，2004），只有通过农民教育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才能依靠农民夺取全国政权。

1.1921—1926年：逐步认识到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关注农民问题。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指出，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②。中共二大之后，强调了要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宣传、发动和组织农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卢少求、周建华，2005）。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命题，并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1926年9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号召“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③。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的农民教育实践活动是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立农民夜校（陈国泳、李琦，2002）和彭湃同志等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殷丽萍，2005），内容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旨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农民的头脑，以唤醒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2.1927—1936年：初步建立起农民教育体系。秋收起义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④。这一时期，农民教育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有了人民革命政权组织实施的力量做保障：一是将农民教育与土地革命相结合，调动了农民革命和学习的积极性；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军事教育与文化教育相融合，为党和红军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培育了后继力量；三是成立中央农业学校、补习夜校等多种形式的农民教育机构，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民教育体系。

3.1937—1949年：坚持为人民解放战争服务的农民教育方针。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⑤。这一时期党的农民教育政策在目标设置、内容选择、组织开展等方面坚持为战争服务，各项政策趋于成熟：一是建构起“教育厅—教育处—教育科—教育助理员—文委主任”五级贯通的教育行政系统（贾钢涛，2015），农民教育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二是在农村建立了儿童团、妇救会、自卫军、救国队等群众自治组织（贾钢涛、闫琼，2017），实现了农民教育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紧密结合；三是进一步完善了冬学、读报识字组、夜校等农民喜爱的教育形式（高宝红、张振，2014），将农民教育有效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农民教育的效果大大提升。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④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二）社会解放与投身新中国全面建设阶段（1949—1978年）：强化农民思想改造和文化扫盲教育，凝聚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合力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即使无产阶级完成了政治解放，在革命实践中夺取了政权、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但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因此，要继续进行社会解放，创建一种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的生产方式（俞益民，2007）。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完成兴国大业的“改天换地时期”（曲青山，2021）。这一时期，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②。这决定了这一时期农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大规模的农民思想改造运动和扫盲识字运动，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引导广大农民为实现社会解放与全面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了创建一种适应新生人民政权的生产方式，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实践探索，并深刻认识到，“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③，强调要加强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文化教育，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集体致富的道路。

1.1949—1956年：农村扫盲教育运动掀起新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都找不出几个识字的人（钟曜平，2019）。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全民性扫盲识字运动。其一，颁布实施了《工农速成中学实施办法草案》（1950年）、《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1955年）、《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1956年）等指导政策，确立了“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因地制宜”“以民教民”的扫盲工作原则。其二，在教育部设立识字运动委员会（1949年）和工农业余教育司（1952年），并成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1952年）和全国扫除文盲协会（1956年），共同指导农村扫盲工作的开展。其三，开创了“速成识字法”“拼音识字法”“记工识字法”等多项有效的农民教育方法，农民学习效率不断提升。截至1956年，全国共扫除文盲2200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李水山、黄长春，2010）。

2.1957—1965年：明确实施半农半读教育制度。这一时期的农民教育政策，在强调要“继续努力扫除文盲，发展小学教育，开展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④的基础上，呈现以下新的特征：一是兴起一场“农业学大寨”运动，通过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进一步激发了蕴藏于亿万农民群众中的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巨大力量；二是实行半农半读教育制度，在办好全日制学校的同时，要大力

^① 《马列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6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发展半工(农)半读、业余和函授教育等^①，半农半读教育制度的确立与实施对于逐步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据教育部 1965 年下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农业中学 54332 所，毕业生人数达到 817 万人，半工(农)半读学校 4000 多所，就读学生人数逾 80 万人(曲铁华、王怡，2011)。

3.1966—1978 年：在为阶级斗争服务中停滞不前。1966—1976 年的十年间，一切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五七指示》明确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②。各地涌现大量的“五七大学”“五七农学院”，与政治夜校、社队干部学习班等一起成为农民仅存的学习阵地。总体来讲，这一阶段的农民教育主要为阶级斗争服务，农民教育事业停滞不前。

(三) 劳动解放与农村生产力活力释放阶段(1978—2012 年)：提高农民职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释放农村改革开放的人才活力

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③。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类解放的目的，因此在完成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基础上，劳动解放至关重要。1978—2012 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富国大业的“翻天覆地时期”(曲青山，2021)。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④，党的主要任务是结合国情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引领经济快速发展和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这决定了这一时期农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农民职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引领广大农民为实现劳动解放和释放农村生产力而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为标志，农民处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能动性，紧紧围绕给农民“松绑”，帮农民解困(武力，2005)，不断加强农民教育政策科学化、法制化和专业化建设。

1.1978—1984 年：恢复、改革、整顿、提高。这一阶段的农民教育政策可以用“恢复、改革、整顿、提高”八个字进行概括。所谓“恢复”，即恢复被中断的扫盲教育工作，确定“一堵、二扫、三提高”的扫盲基本方针^⑤。所谓“改革”，即将农民教育的重点转移到学习科学技术上，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基地成为农民教育的主要平台。截至 1986 年，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已建立起 28 个省级和 2300 多个县级分校，24000 多个乡镇基层教学班(李水山、黄长春，2010)。所谓“整顿”，主要指对“五七大学”的整顿，提出将县办“五七大学”改编成农民技术学校或高等学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规汇编(1949—1985 年) 教科文卫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2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5 页。

^④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74 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规汇编(1949—1985 年) 教科文卫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6 页。

校。所谓“提高”，主要指将“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从宪法层面明确农民教育的法律地位。

2.1985—2002年：“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这一时期，《扫除文盲工作条例》（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等多部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农民教育的法律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一是明确提出，使农村教育形成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统筹（简称“三教统筹”）发展之势（陈江平，1999），对于整合农民教育资源、提升农民教育效率具有重要价值。二是成立全国农科教结合协调领导小组，先后推行“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丰收计划”，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大幅提升。三是随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关于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意见的通知》（1994年）等的颁布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制度逐步完善，对推动实现农民职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3.2003—2012年：培育新型农民的教育目标更加明确。进入21世纪，农民教育政策和教育体系呈现比较成熟的科学化、法制化、专业化特征。一是将“要积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了农民教育培养目标。二是颁布实施《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2003年）等政策，确立了“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引导用人单位和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三是先后颁布实施《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2003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等中长期规划，农民教育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连续性不断增强。

（四）个性解放与美好生活建设阶段（2012年至今）：提升农民主体性发展能力，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马克思把人看作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而诞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存在物，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人的存在发展三形态学说”，即“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形态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三者分别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为基础（转引自胡红生、张军，2003）。与之相对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了单个人历史性生存的三种状态，即“狭隘的地域性个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转引自向延仲，2007）。人的解放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有个性的个人”逐步代替“狭隘的地域性个人”和“偶然的个人”的过程，并且人对社会关系的自主性将伴随这一过程不断提升。随着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走向深入，农民的个性将不断得到解放。2012年至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21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的“惊天动地时期”（曲青山，2021）。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力推动中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这就决定了农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农民主体性发展能力，引领广大农民为实现个性解放和建设更高质量的美好生活而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标志，农民生活质量大幅提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推动农民教育政

策和实践持续创新发展。

1.形成了新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思路，如“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人居环境，是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把这些民生事情办好。新增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要向农村倾斜，社会建设公共资源要向农村投放，基本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城市社会服务力量要下乡支援农村，形成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合力，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①，“乡村振兴要靠人才、靠资源……要想设法创造条件，让农村的机会吸引人、让农村的环境留住人，特别是要让一部分年轻人热爱农村农业，培养造就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改善农村人口结构”^②，“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要用好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远程教育，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共享”^③等，为新时代农民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

2.明确了新的培育目标——新型职业农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之后又颁布实施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13年）、《“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2017年）等系列政策，进一步明确了“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能力要求，以及“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市场机制、坚持立足产业、坚持精准培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本原则。从“农民”到“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是称谓的变化，更标志着中国农民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3.建构了新的体制机制——“一主多元”体系。为了解决“如何教育培养农民”的问题，农业部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意见》（2013年），明确提出，“坚持‘政府主导、行业管理、产业导向、需求牵引’原则，聚合优势资源，形成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为主体，以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院校和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及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以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地，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多层次、多形式、广覆盖、经常性、制度化教育培训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有效提升了农民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和精准化水平。

4.健全了新的内容体系——“六位一体”新方案。党和国家围绕提升农民的科学素质、生产技能和管理能力等核心素养，制定实施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材建设的通知》（2015年）、《乡村振兴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2年）》（2019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2020年）等系列政策，逐步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统领，生产技能教育为核心，创新创业教育为龙头，卫生健康教育、文化艺术教育、生态环境教育等为支撑，涵盖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六位一体”农民教育内容体系。

^①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264页。

^②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95~396页。

^③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96~397页。

5.完善了新的保障体系——公益性补偿制度。为了保障每个农民的学习权利,《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办法》(2014年)、《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春潮行动”实施方案》(2014年)、《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2016年)等系列政策颁布实施。一方面,国家财政加大投入,直接用于农民培训的经费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关于农民学员学费和助学金的资金划拨、资助标准、资助程序等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教育公益性补偿制度逐步建立健全。

二、农民教育政策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伟大实践的中国创举

纵观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的百年发展史,虽然因为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发展的主要任务不同而形成了农民教育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区别和差异,但是党的农民教育政策始终坚持为农民解放和农民全面发展服务,并呈现内在的规律性特征。具体来看,至少涵盖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 始终坚持党对农民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确保农民教育的初心不改、使命不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①。始终坚持党对农民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确保农民教育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百年发展的本质特征。一是突出思想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的指引下,不断丰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持续完善农民教育政策。二是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将农民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紧密结合,既有助于通过基层组织领导农民教育实践,也有助于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保持和加强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三是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以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打通农民教育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公里”。

(二)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农民教育根本立场,将人民性贯穿农民教育全过程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②,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③。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将人民性贯穿农民教育全过程。首先,坚持农民教育依靠农民。党深刻认识到“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④,特别重视广泛发动农民。其次,坚持农民教育为了农民。在制定和实施农民教育政策时通常与土地政策相结合,有效调动了农民参与学习和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动性。最后,坚持农民教育惠及农民。重视帮助处境不利的农民获得学习机会,从最初的义务教育的组织开展到今天的农民教育公益性补偿制度的不断健全,推进农民教育优质化、均衡化发展,是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②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③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

（三）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农民教育根本原则，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教育道路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房广顺，2018）。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优化农民教育政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教育道路。其一，在宏观层面，坚持农民教育的目标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一致。其二，在中观层面，坚持农民教育的体制机制与党和国家的政治体系相适应。其三，在微观层面，坚持农民教育的内容与农民的现实需求相匹配。回顾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在任何时期都牢牢把握“立足实际、服务现实需求”的原则，将农民教育的目标、体制机制和内容有机融入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大系统。

（四）始终坚持“服务农民全面发展”的农民教育根本目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民生产力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最高命题（俞可平，2001），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始终坚持服务农民全面发展，致力于农民的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劳动解放和个性解放，最终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其中，政治解放即领导人民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是政治制度的解放；社会解放指创建一种新的适应进步的发挥农民自主活动能力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的解放；劳动解放是实现农民自由自觉地劳动，是生产力的解放；个性解放主要是指帮助农民不断突破外在与内在的禁锢，是主体性的解放。随着农民教育政策的持续实施，农民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农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不断提升，农民的职业属性愈加明晰，农民的发展得到有效保障并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五）始终坚持“农民作为成人学习者”的农民教育基本规律，多形式开展农民教育实践创新

成人教育学者马尔科姆·诺尔斯认为，与儿童学习者相比，成人学习者丰富的人生经验成为其重要的学习资源，成人学习者的学习意愿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密切相关，更倾向于学习那些能够“即学即用”的知识（转引自赵红亚，2004）。农民作为成人学习者，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理论逻辑起点。在百年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针对“农民作为成人学习者”的独特性多形式地开展农民教育实践创新，从早期的农会、农民夜校，到后来的冬学、农民业余学校、田间学校，再到今天不断健全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农村社区教育体系以及农业学历教育体系等，开创了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民教育的奇迹。

三、农民教育政策演进的重要启示：指向全体农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通过消灭产生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命题或最高价值（俞可平，2008）。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

的解放才能完成”^①。经过百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专业化、科学化、法制化、精准化水平不断提升，指导农民解放实践的能力显著增强。但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民教育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农民参与农民教育的主体意识仍然比较淡薄，农民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依旧突出，农民教育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双重影响叠加，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②，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党章，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教育大有可为。基于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演进的历史脉络，放眼全球农民教育政策改革发展趋势，通过认真学习领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精神要义，可将农民教育政策最终指向归纳为“全体农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农民教育应更加关注农民的文化精神成长与内生发展动力激发，通过高质量的农民教育推动形成农民内生性发展文化，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面向全体农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构筑农民教育目标政策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包含“人的完整发展”、“人的和谐发展”、“人的多方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四个层面的内容（扈中平，2005）。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承担者和推动者；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人的素质高低、人的发展程度高低，直接决定了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大小（郝立新、王为民，2003）。促进农民解放、帮助农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的根本目标。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完善农民教育内容政策

农民教育内容政策是实现农民教育既定目标的资源基础，为了帮助全体农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要进一步完善农民教育内容政策。一是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农民教育全过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农民生产技术教育、文化艺术教育、生态教育、卫生健康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每个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二是重视思想政治、文化知识、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教育，实现农民物质力的提升与精神力的解放相统一。三是加强农民的创新创业教育，打造乡村振兴和农民全面发展新的增长极。

（三）以“培育农民的主体性”为核心，优化农民教育动力政策

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认识和改造客观对象的活动中体现出的人的特征。农民教育归根结底是“关于农民、依靠农民、为了农民”的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充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② 参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1958.htm。

激发农民主体性。其一，强化农民对于农民教育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权，将农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程度、农民的满意程度和农民的获得感作为农民教育政策效果评价标准。其二，保障农民参与农民教育政策制定的权利，从“三农”发展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入手，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设计农民教育政策，制定实施方案。其三，优化相关激励政策，提升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农民教育政策有效落地。

（四）以“信息技术与农民教育的深度融合”为方向，创新农民教育路径政策

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信息技术与农民教育走向融合是大势所趋。面向未来，应在更广阔的视域下推动信息技术与农民教育的深度融合。首先，建设农民教育资源库，帮助农民教育突破时空限制，扩大农民教育优势资源的传播范围，缩小区域间的农民教育发展差异。其次，推动农民教育与其他类型的教育有机融合，有效整合农民教育资源，形成农民教育发展合力，建构农民教育发展的新格局。最后，加强对农民教育需求的基线调研，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的教育需求，进一步优化政策，为不同的农民提供个性化、特色化、定制化的教育服务。

（五）以“农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健全农民教育保障政策

新时代应加快农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农民教育实现高质量和高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其一，研究制定全国性的农民教育专门法规，为农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制保障。其二，优化农民教育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形式结构和布局结构，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农民教育体系，为农民提供长效的教育服务。其三，完善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制度，推动农民走向更高水平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其四，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农民教育的支持力度和对口支援力度，促进农民教育实现高质量均衡发展。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的百年发展，本质上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引领中国农民实现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将培育“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教育体系不断发展完善。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教育体系的新格局，引领中国农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的持续完善和不断推进，不仅有助于补齐人才短板、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同时也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陈国泳、李琦，2002：《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及其时代意义》，《党的文献》第3期。

- 2.陈江平, 1999: 《基础教育改革全书》,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 3.陈晋, 2017: 《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北京日报》11月13日。
- 4.陈静, 2004: 《毛泽东的农民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理论月刊》第10期。
- 5.陈述, 1999: 《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4期。
- 6.房广顺, 2018: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本原则》, 《辽宁日报》6月5日。
- 7.高宝红、张振, 201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及现实价值》, 《学术探索》第6期。
- 8.郝立新、王为民, 2003: 《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
- 9.胡红生、张军, 2003: 《从马克思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看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变革》, 《学术界》第2期。
- 10.扈中平, 2005: 《“人的全面发展”内涵新析》, 《教育研究》第5期。
- 11.贾钢涛, 2015: 《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党政研究》第3期。
- 12.贾钢涛、闫琼, 2017: 《党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 《人民论坛》第20期。
- 13.李水山、黄长春, 2010: 《当代中国农民教育史》,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 14.刘同舫, 2012: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及实现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 15.卢少求、周建华, 2005: 《对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三性”分析》, 《毛泽东思想研究》第3期。
- 16.齐鹏飞, 2011: 《90年来关于“党史分期”问题的探讨和阐释》, 《光明日报》9月28日。
- 17.曲青山, 2021: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光明日报》2月3日。
- 18.曲铁华、王怡, 2011: 《嬗变与思考: 新中国60年农村职业教育回眸》,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7期。
- 19.王达, 2001: 《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 《中国农史》第1期。
- 20.武力, 2005: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三次农民浪潮》, 《河北学刊》第5期。
- 21.向延伸, 2007: 《马克思关于个人历史性规定与“三形态”关系探析》, 《求索》第9期。
- 22.殷丽萍, 2005: 《中共“二大”与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兼论彭湃对中共“二大”农民运动思想的发展》,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
- 23.俞可平, 2001: 《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5期。
- 24.俞可平, 2008: 《努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谈〈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
- 25.俞益民, 2007: 《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与人类解放——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逻辑与现实》,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26.袁杰, 2017: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与实践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7.赵红亚, 2004: 《试论诺尔斯的成人教育思想》,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期。
- 28.钟曜平, 2019: 《铸就辉煌的教育道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 《中国教育报》9月29日。
- 29.庄福龄, 2004: 《简明马克思主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 ¹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²西南大学中国西部教育发展研究院;
³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王 藻)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olicy on Peasant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Evolution and Experiences

LIU Yibing ZHU Shenghui LIU Da

Abstract: Guided by Karl Marx's theory of emancipation of though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basic experien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peasant education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how the CPC undertook its mission, appli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o China's peasant education and persisted in leading peasants to a better life. The evolution of peasant education polic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stages: political liberation and striving for democratic power (1921-1949), cultural liberation and joining in the all-round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1949-1978), labor liberation and unleashing vitality in rural production (1978-2012), and personality liberation and building a better life (2012 to now). Reflecting on the histor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PC's peasant education policy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to the starting point of "people-centered",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aking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primary goal of "serv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asants", and to the principal law of "peasants as adult learners". In essence, it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CPC creatively uses the Marxist thought of human emancipation to lead Chinese peasants to realize their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priority of peasant educa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ural and spiritual growth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tivation. The high-quality peasant education will cultivate a cultur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inexhaustible power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asant Education Policy; Peasant's Liberation; Peasant's Subjectivity